
An Interpretative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ret Societies: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Part II

Xu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nkuwangxu@foxmail.com

早期中国革命起源的秘密结社阐释——一个社会思想史的回顾与反思（之二）

王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bsorbe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raditional secret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The White Lotus, the Tiandihui, the Gelaohui, the Triad, and the various secret societies that had emerged in the Taiping and the Boxer rebellions were all incorporated into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secret societies' slogans of "overthrow the Qing and restore the Ming" and "rob the rich to help the poor" merged with the revolutionaries' platform of "drive out the Manchus" and "relief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inally advanced the success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was turned into a coherent historical narrativ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sen and Song Jiaoren carefully assessed the func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and distinguished them from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other hand,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uch as Mao Zedong, Qu Qiubai, Yun Daiying, and Chen Duxiu, emphasized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suitable role they could play in the revolution, thus showing a dynamic strategy of allying with these organiza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ecret societies reflects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the underclass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secret society – early revolution – transformation of displaced people – social mobility –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摘要

20 世纪前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吸收了传统秘密会党与江湖结社的文化资源。渊源自不同时期与地域的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及帮会力量，被纳入国民革命史的叙述系统之内。秘密结社的反清

复明、劫富济贫口号与革命党的驱除鞑虏、救济民生纲领，最终合流并助力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起具有连贯性的历史书写。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审慎评估了民间会党的作用，区分了秘密会党与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相比而言，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陈独秀等人，更为看重对于秘密会党的思想改造与合理运用，呈现出动态的联合策略与组织形式。中国革命和秘密结社之间的关系史，侧面反映出下层社会变迁的底色与逻辑。

关键词

秘密结社 - 早期革命 - 游民改造 - 社会流动 - 国民党与共产党

二、底层社会与革命起源

江湖会党、帮会势力或者说民间教派群体，多数是下层人物，流行于普通民众，并不具备书写自身历史的动力，但却影响了历代王朝的更迭与循环，“秦汉以降，上下两千年间，革命之事，殆居十之三四，未尝不与秘密社会有因果关系也”。^①清末之际，革命党逐步建构起会党民族（种族）革命史的源流，“汉家正统自英雄”，“昔刘邦以亭长而定汉基，朱元璋以布衣而奠明祚。郡县世界，天命所属，都在草泽英雄”。^②崛起于江湖的起义英雄（枭雄）与反抗人物，被赋予了特殊的革命史意义，“历史上的革命运动，由于参加革命的人民不能坚定的把握，终于被浑水摸鱼的人掠去，使人民受到更多困苦，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历史教训”。^③帮会人物汪禹丞在《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中，述论洪门的旨归，“洪门会数百年来之历史，一部民族革命史也。满清季世，吾会同志，以追随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此盖不可掩之事实”。^④光复会陶成章作为革命党人，同时又属江湖大佬，对于下层文化与秘密结社的关系颇有论断，“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⑤

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思想文化层面吸收与浸染了传统秘密会党与江湖结社的组织资源，“兴中会的势力，最初本以内地的秘密结社和各地侨胞的洪门会为基础”。^⑥渊源自不同时期与地域的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太平天国、义和团及帮会力量，被纳入民族革命史的叙述系统之内，“在革命斗争中，初时革命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人们认为革命是犯法的暴乱行为，是大逆不道。凡戮力从事革命者，多视为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不耻于人伦，故而联络下等社会，不失为一个革命策略”。^⑦在诸多革命史文本阐释之中，民族革命为“天地会、哥老会的余绪”。^⑧萧一山对于民族革命史的简约表述，“天地会

^①[日]平山周（1927）：《中国秘密社会史·叙言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页。

^②黄小配（1936）：《洪秀全演义》。上海：通俗图书刊行社，第1、23页。

^③萧荻（1936）：《草莽英雄的现实意义》。《学生日报》11月30日，第3版。

^④刘联珂（1941）：《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澳门：留园出版社，原书不设页码。

^⑤汤志钧编（1986）：《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第423页。

^⑥杜冰坡（1930）：《中华民族革命史》。上海：北新书局，第4页。

^⑦区渭文（1935）：《革命斗争及其策略》。《创进月刊》第2期，第2页。

^⑧萧一山（1948）：《非宇馆文存》卷2。北平：经世学社，第26页。

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①，大致显示了一种时代认识。因此，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以秘密结社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影响了变革时代社会秩序的重构，至今仍是一个富有生机且兼具现实性的领域，可以加深对于革命运动的微观理解。

（一）秘密结社与海外认识

1980年，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在访谈中感叹“研究明清秘密社会史的人员太少”。^②1980年代之后，从王朝断代、某一时期、到某一组织(白莲教、天地会、天门会)等重要讨论对象再到一些小股或旁枝的秘密结社群体，秘密社会史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与研究群体。来新夏在论及秘密社会研究时，曾指出：“当下学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著名的大型结社的探讨，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著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展开，缺乏翔实的个案研究和横向比较”。^③2000年后，随着资料深入挖掘及研究取向的变动，地方秘密社会史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资料与论著。《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一书以现存清代档案为基础，参阅清代官修史书、地方志、士人笔记等，系统反映了秘密结社的活动。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秦宝琦编撰的《中国地下社会》和刘平、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人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等书，从较为系统的角度审视了秘密结社的历史演变及地域化特征。

相对而言，秘密结社虽说是一个艰深的领域，但是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日本学者平山周、山口昇等人对于中国秘密结社的研究，从亲历与观察的视角，均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具有某种开创意义，也指向了早期革命党与各省会党之间的微妙联系，将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及同盟会、光复公会纳入一个脉络系统加以叙述，并影响了日本学人秘密社会史研究的路径。1925年，何西亚出版了《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一书，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对盗匪的定义、起源、种类、历史观、组织与规律、生活状况等问题做了概要式叙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30年，上海华通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纳武津的《世界秘密结社》一书，其中总结了秘密结社运动的原因有六种：“偶然的变故、新思想的潮流、社会及政治的情形、事实上或想象上的不平、外人的支配、犯罪的动机”，^④是一种社会学的归纳方法。1930年代末，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通、日本情报工作者波多野乾一撰写了著名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一书，将中共领导人事略与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上应天星”的宋江、吴用、卢俊义等人一一对应，供日本军官阅读与了解中共，可以看出日方对于中共革命的一种认识。^⑤1967年，佐佐木正哉在东京出版了《清末的秘密结社》一书，详细汇集了秘密结社的相关资料。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认为，1919年到1927年间革命的根源需要追溯，即使1949年以后的革命根源，也能从十九世纪找到发展线索。而且，秘密组织与革命党人的合作亦影响到了革命的最终结

^①萧一山(2005):《清代通史》第1卷《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页。

^②编者(1980):《学术动态·研究明清秘密社会史的成员太少》。《社会科学》第4期,第140页。

^③来新夏(2002):《邃谷文录:来新夏自选文集》(历史学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④[日]纳武津(1930):《世界秘密结社》。上海:华通书局,第2页。

^⑤[日]波多野乾一(1940):《延安水浒传》。南京:时代晚报社,第1-49页。

局与权力结构，具有复杂的历史联系。^①裴宜理对于百年华北地区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关联与共进，进一步充实了这种认识。^②罗威廉(William T. Rowe)独辟蹊径，从长时间考察了麻城的暴力形成与对地方秩序的影响，建构出基层社会暴力来源、民间会社和秩序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寻找近代革命的历史发展机制。^③基于群体范畴而言，盗匪、流民、游民、流氓等群体往往与秘密结社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如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陈宝良《中国流氓史》，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论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秘密结社与革命发育、革命动员、革命意识之间，其关系尚需进一步厘定与疏通。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于秘密社会的兴趣，逐步走向了社会史、文化史的多元路径。1972年，法国学者谢诺(J. Chesneaux)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群众运动与秘密社会(1840-1950)》一书，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秘密社会在中国近代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1977年，英国学者戴维斯(Fei-Ling Davis)所著《中国最初的革命者：19世纪后期秘密社会研究》在伦敦出版，侧重探讨“华南天地会的功能、组织机制及其相关背景，借此来揭示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发展轨迹”。^④美国学者韦斯蒂(Stephen C. Averill)所主编的《中国大众宗教》一书，汇集了十位学者的论文，尤其是韩书瑞的《反叛间的联系：清代中国的教派家族网》、《中华帝国后期白莲教的传播》，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新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近年的相关研究，如《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等，则兼具民间结社源流考证的严谨与新文化史意义的幽微。

(二) 民间结社与晚清叛乱

吏治相对清明、土地分配合理、发达的租佃关系和朝廷“仁政”之下的低税负率，可以造就一段时间的“盛世景象”。但中国长期的历史证明，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自然经济之下民众抵抗自然灾害与社会变动的能力相对脆弱。嘉道之际，龚自珍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景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⑤尽管这并不是一种准确的估量，具有某种感性色彩，但直接反映出社会机体的内部变化。而后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对于太平天国利用基督教学说兴盛所秉持“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的说辞，在维护官僚体制之外，还有正统文化沦丧的忧虑因素。

民众运动的扩散和频发，清代中期之后成为一个普遍化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了消弭与镇压各地迭起的民变，朝廷对于参与带有叛乱性质的教派、会党与结社者采取就地正法的从重处置，司法与审判权力下沉，但并

^①Mary Wright (1968)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19.

^②Elizabeth J. Perry (1980)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William T. Rowe (2006)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夏春涛(2001):《近代秘密社会研究述评》。《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第4期，第47-51页。

^⑤龚自珍(1975):《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6页。

未遏制住地方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对于底层反抗做出了粗略统计，“从 1836 年到 1911 年或大或小的民众运动达 3288 次”。^①美国学者安乐博（Robert Antony）深入讨论了清代广东地区的土匪活动与社会治理，在乾隆皇帝统治晚年，社会机体已经出现了难以遏制的衰退。安乐博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民变与起义活动，如山东王伦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贵州、湖北和四川的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1780-1810 年华南大规模的海盗扰乱，广东惠州府的三合会起义，华北八卦教起义，广东、广西、湖南的山区瑶族起义等。这些规模或大或小的民间变乱，“多数都与传统中国秘密结社关系非浅”。^②相比于微观的讨论而言，西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则从不同角度对近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做出研究，理论构型呈现多样化，无论是内卷化、过密化、道义经济抑或理性小农，所关怀的更多是过渡时期经济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内在反应问题。当然，其中也包含了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起源问题。实际上，“作为弱者的农民其结社、反抗及派生行为，虽然不是完全有效的且带有隐蔽色彩，但客观上也促使了社会的变革”。^③

会党组织与秘密教门，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与市镇经济的产物。在传统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中，民众除了接受行政力量的管控之外，还需要宗族、行会、会社等组织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形成了朝廷管理真空地带之外的“网络结构”，是一种功能上的替代。基层民众处于公私重叠的关系空间之内，清政府对民间结社“根株不尽”与游民大量滋生颇为警惕，《大清律》中规定：“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并轮叉舞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者，并严行禁止”。^④作为管理行为的游民控制与作为自发结社的民众集聚，演变为一个行政治理问题。从革命的发动层面来说，由齐民到游民乃至 20 世纪政党将民众组织起来，是社会结构重组的显著表征。同时，民间“结会树党、拜把成团”，势必形成强大的边缘/绿林群体。康熙之后，“地丁合一”的赋税趋向、相继垦殖的土地和古典农业经济的精熟化，促进了帝国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游民的名目繁多，包括了流民、流氓、强盗、无赖、乞丐、郎中、游方僧道、土匪、会党、帮会、异端教派成员、移民群体等，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结构。道光十五年（1835 年），黄爵滋在其《敬陈六事疏》中提到一些他所知道的地方结社名号：“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峒匪、江北之盐匪、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窃匪”。^⑤但实际数量并不止于此，一些具有地域特征的结社“不著名目”但在基层社会活动猖獗。各个地区称号名目之多，远超黄氏所论的范围。可见，人口的集中增长、土地占有及收歉状况、城镇经济产业的初步形成和源远流长的传统底层结社思想，都会影响人群的组织化。自然，社会结构的分化、对暴力反抗和革命发育之间产生了重要的联系。

^①[美]费正清主编（1985）：《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658 页。

^②Robert Antony (2016) *Unruly People: Crime,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25-26.

^③[美]斯科特（2007）：《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前言。

^④张友渔、高潮主编（1991）：《中华律令集成·大清律例卷·三十二·刑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74 页。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19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 1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第 481-482 页。

从学术视角来说，民众结社与革命起源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于中国革命的判断具有独到的眼光：“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①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农民具有独特的韧性和勤奋，除了生存之虞以外，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良善和顺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男耕女织，安分守己，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风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民间俗语揭示了传统时代中国人的性格。在相对静止的生活节律中，基层民众通过集市、庙会、民俗信仰与有限的娱乐方式获得了地方性知识和生存之道。20世纪初期，美国来华观察者罗斯（Edward A. Ross）也持类似看法，“多数中国人都性格稳健，甚至宁愿苟延残喘地活着”。^②而中国小农经济模式的困境，伴随着乡村自然经济及手工业的衰落，为求生计，农民不断离村离籍，涌入邻近市镇和产业集聚地（煤矿、盐场、铁矿等），形成数量众多的无业游民和雇工群体，改变了原本相对静止和依附于土地的日常生活。1853年，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王懿德报奏朝廷，涉及多个地方会社名目：“闽省上下游，会匪有红钱会、闹公会、小刀会、江湖会、红会、花会、烧纸、坐台、铁板令、草鞋令、过江龙各色名目，名异实同，纠连江西、福建诸匪，自道光二十一年以来，上下朦饰，遂成厝火积薪之势”。^③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军兴以来，文职武弁，崛起草泽。迁流日久，侥幸之心生。以利禄为易得，而争事繁华。变朴厚之旧风，而群趋器竞”。^④到了晚清之际，秘密会社无孔不入，“常备巡防各军，多有哥老会”，^⑤这种局面带来了复杂的治理困境。

晚清各色秘密结社所蕴含的反抗能量，与西方的冲击共同构成了晚清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结构变异。事实上，早期革命党的社会动员，与秘密结社所建立的地下系统密不可分，主要以“反清复明”、“反满兴汉”的种族革命为主要特征。辛亥革命前后，多数会社首领的知识层次不高，受民间戏曲和江湖文化尤其是瓦岗、水浒、杨家将、七侠五义、杂史掌故、历代开国事迹等古典故事的影响较大，“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⑥值得玩味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对早年孙中山策划革命，如此评述：“总之，称为某会的秘密结社之事，皆恰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⑦因此，早期中国的传统色彩与现代导引，不断促进了底层社会的重构。

（三）阶层固化与革命意识

梁漱溟曾对传统中国社会构造有一个经验论述，“中国旧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⑧代表了一种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认识。实际上，近代中国种种下层社会成员，在普遍贫困的状态下，通过结社形成了不同于正常社会组织系统。秘密社会的兴盛与整体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

^①[美]费正清（200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1页。

^②[美]E·A·罗斯（2016）：《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张彩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54、92页。

^③洪卜仁主编（1994）：《闽南小刀会起义史料选编》。厦门：鹭江出版社，第7页。

^④钱基博（2012）：《近百年湖南学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4-45页。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1957）：《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01页。

^⑥鲁迅（2005）：《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2页。

^⑦陈锡祺主编（1991）：《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83页。

^⑧梁漱溟（1992）：《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第264页。

1741年至1794年，中国人口从1.43亿增加到了3亿以上”。^①蔡少卿论及清代秘密会党出现根源之时，指出“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②两大根源。同时，城镇娱乐文化的兴盛，打破了依附于土地的既定规制，派生出诸多寄食于非农谋生的职业群体。清人王元榜的《庚癸纪略·辛酉》记曰：“（周庄）来枪船几十号，在东栅大开博场，昼夜演剧。妓船数十号蚁聚，无赖之徒皆入党摆庄”。^③游民滋生的社会变乱，影响了秩序的安定，“近年内地无业之民，流为盗贼，杀戮之惨，实不忍言。即如广东一省，岁杀二三千命之多，而抢劫如故”。^④民间结社的不稳定性，在于职业生计的临时性和阶层分化，也就注定了这个群体的“不安定”特质。清末之际，部分地区土地占用状况已经失衡：“一邑之中而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数千亩、数百亩、数十亩者有焉”。^⑤根据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显示，“全国总计全家离村的农户达1,920,746户，占调查各县总农户数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的农家为3,525,349户，占调查各县总农户的8.9%”。^⑥秩序紊乱之下，各地以保甲制度为民众自卫的方式，“保是民户编组的行政，甲是壮丁编组的行政，其目的是使同一地方的住户，对于地方上的治安来共同负责，不使外来的土匪乱民混入地方，并且自己互相监视和保证，使地方不致产生匪徒和败类”。^⑦流动人口的增多与民间自卫力量良莠不齐，阶级间矛盾急剧扩大，大城市产业自然并不能及时吸纳，给政府管理增加了难度。

除此之外，社会流动的阻塞性与传统教育体制的精英色彩，使得阶层转移呈现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士人群体的范围内，普通民众和一些仕途不顺利的读书人无法侧身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生发出“革命意识与推倒重来”的变革观念。在14-18世纪的几百年间，“至少有40%通过高级别科举考试的人，是出身于三代以内不曾出过官吏或候补官吏的家庭”。^⑧这样一种半封闭的社会机制，一度带来了流动的公平性。但随着财富与教育关系的紧密，逐步僵化。华裔学者何炳棣的经典研究认为，“清末约有生员50万人，举人4万人，进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举人约占0.001，进士仅约占0.0001”。^⑨更何况，这其中有一部分也并不能够按时补缺得到职位。另外在样本上，“科举流动集中于几百个强势家族中，他们替补和占据着大部分政治资源”。^⑩也就是说明清以来，往往只有大家庭或经济状况良好的家族，历经几代人努力，训练家中少数有资质的少年长期

^①郭松义：《清代人口的增长与人口流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主编（1984）：《清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第103-138页。

^②蔡少卿（2009）：《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2013）：《太平天国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98页。

^④李文治编（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第942页。

^⑤章有义编（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第4页。

^⑥中央农业实验所1931-1933年调查编纂（1936）：《全国农户离村统计》。《农情报告》第7期，第10-15页。

^⑦葛苓（1942）：《怎样做个好保长》。南昌：新赣南出版社，第7页。

^⑧Richard J. Smith (1994)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2*.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 81.

^⑨Ping-Ti Ho (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73-189.

^⑩张杰（2003）：《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16页。

艰苦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科考功名，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多是流于幻想。到了清代中后期，捐纳、团练等模式的兴起，经济要素与功名生产直接建立了联系，“自捐例大起，士农商嚣然有不靖之心。流弊所极，名分混淆，公私骚扰，一国皆贵，殆非治征”。^①原有流动机制的时代变异，这种地位的再失落，促成了底层民众和梦想凭借科举晋升的贫寒士人（主要是缺乏经济力量捐纳）产生无力感。事实上，清末新式学堂的建立，加深了城乡之间的撕裂，“求学为富人所独占”，^②并未改变中国阶层流动的合理化，这也展现出革命何以发育的逻辑，“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③酿造出激进革命的文化土壤。

客观来说，秘密结社在地方社会复杂的阶段性特征，集中体现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管控与社会形态的总体演化趋势。清代中期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后，朝廷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由秘密宗教、民间结社等因素引发的大规模叛乱已经彰显了帝制中后期社会状态的复杂性，社会控制力不断衰减，民间秩序和财富分布更趋恶化，民间结社“聚众敛钱，终流为不靖”，^④而这一趋势直至清廷倾覆也没有消退。清末民初之际，秘密社会大部分为革命党所导引，失去了原有的秘密色彩，步入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轨道之中。辛亥之后光复诸省中，江湖势力举足轻重，逐步拥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而未政治化的会党社团，或被地方军阀所吸纳，或流入土匪行列：日则沿街设赌，夜间不问可知，乡间抢劫可闻，成为权力异化之后的底层痼疾，“满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财气之外，更加以阴险反复奸黯凉薄，而视为英雄所当然”。^⑤战乱纷争，社会经济崩颓，“农民大率失业，兼之兵燹频仍，匪氛不靖，支应浩繁，穷困已极。小农不少或已经失业而变为土匪”。^⑥革命必然带来权力的重组，“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投入战争、扶助革命军得胜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绅”。^⑦

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存在着地域差异和多样性，革命最终的走向则是形成了“政党化国家”。孙中山对于传统中国民众的看法是“一盘散沙”并麻木不仁：“人民只要纳粮，便算了事，不管谁来做皇帝，也都是可以的”。^⑧一般情况下，底层民众缺乏反抗的政治倾向，革命意识是需要培育与宣播的。1929 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了党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的有害性，并提出了锻造红军的具体方法与要求：“（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

^①王先谦（1984）：《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第 1473 页。

^②凤凰出版社编（2004）：《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62 册。常州：凤凰出版社，第 240 页。

^③张枏、王忍之编（1960）：《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615 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198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 5 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166 页。

^⑤梁启超（1989）：《饮冰室合集》第 4 册《专集》。北京：中华书局，第 131 页。

^⑥王北屏（1931）：《陕西之社会文化：扶风城乡现状》。《新陕西月刊》第 4 期，第 56 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86）：《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785 页。

^⑧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1985）：《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第 505 页。

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无疑是成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在乡土中国和农村根据地的舞台之上，锻造与释放了底层力量的重新凝聚。

（四）政党动员与革命走向

20世纪前期中国革命运动走向社会内部与纵深扩展，社会结构在多重力量下的变革，秘密社会皆有事实上的作用与实践。尽管如此，作为政治精英的早期革命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要科学合理地引导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民，依旧存在很多困难。秘密结社毕竟属于下层文化，与精英文化还是有所隔阂。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的农民运动，一度步入脱离组织和自由化境地，背离了革命的目标，“现在党不能指挥农民群众”，^②可见难度之大。1936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认为，“哥老会、青红帮、三合会、红枪会等属于秘密结社，是不满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③需要组织起来才能构成革命的基本力量。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来说，多数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将其动员起来颇为不易。即便动员起来，所呈现的无序性也不易控制。1930年，邓中夏参考了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书，在莫斯科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专论了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兼及帮口、码头与苦力，纳入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体系之内：

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零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

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三合会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们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着组织方式，互相帮助着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是用武力斗争的办法，打架，械斗等等。他们的首领，也大半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都模仿着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④

这样一种叙述，具有一定的认识根基。早期职业革命家擅用演讲、图册、布告及流行民间的故事动员民众，以传统会社作为中介，秘密开办印刷机构，

^①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4页。

^②陈登贵、江铁军编（1986）：《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8页。

^③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81）：《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68页。

^④邓中夏（1949）：《中国职工运动史》。天津：知识书店，第1-3页。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宣传文字，贵能提纲挈领，词意愈简单，人愈明了。一切运动，无不成功。引起民众信仰者，在事实不在理论”。^①从会党首领到辛亥前后革命军的“各级统领”，秘密结社的组织转型，在主动或被动中也适应了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尽管民国初年有“社团改进会”、“中华民国共进会”、“中国社会党”等渊源自会党的早期政党，“徒党既众，良莠难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令难于编辑，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覆舟，可为深惧”，^②秘密结社政党化的诉求并未施展开来，且江湖暗杀之风兴盛。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急剧变易，秘密社团“劣化”的速度不断加快。

1926年，瞿秋白在其《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中分析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迟缓，在历史的过程中因为人口增加而发生问题，每一个时期都是如此，而有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继而，瞿秋白分析了农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不同，反思了旧式革命的不足，“每次的农民革命成功之后，政权都落到别人手里，农民自己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是因为有下列的缺点：（1）没有良好的组织。（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的农民就不尽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与工人联合奋斗，农民得到这支生力军的辅助，形势当然不同，不象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③可以说，瞿秋白显然认识到了作为革命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黄文治关于中共与民团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共发动农民运动之前，枪会就遍布于直、鲁、陕、豫等省，尤以豫省为最。民团产生相对较晚，其基础多为枪会组织。枪会组织名称繁多，有红学、黄学、黑学、白学等。豪绅地主组织农民群众成立诸学的政治目的是拒匪抗捐、武装自卫。在农村革命中，中共与民团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在中共缔造的鄂豫皖苏区，这种复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④

秘密组织与早期革命政党之间，因时而变，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关系。1913年，宋教仁在演讲中对于革命党和革命政党进行了辨析，“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革命党是对敌人奋斗，革命的政党是对敌党的奋斗；革命党是旧的破坏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⑤已经体现出一种微妙的褒贬变化。1928年国民党实现形式统一之后，国民党禁

^①刘成禺（1997）：《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137页。

^②李安庆编（1982）：《社团改进会群进会申请立案档选》。《历史档案》第1期，第36-46页。

^③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0-383页。

^④黄文治（2021）：《中共豫南革命与商城民团研究（1927-1932）》。《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第140-152页。

^⑤陈旭麓主编（2011）：《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第456页。

止“私立党会”，秘密会党逐渐演化为帮会或黑社会组织；秘密教门则蜕变为会道门，成为落后和反动的组织。政教界收缩了革命年代对于民间宗教力量的鼓励态度。民国时期西安帮会林立，尤以青帮为甚，从秘密走向公开：“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以其所居住之地点论，城关皆有。以收徒之素质论，几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入会参加其活动者”。^①不少民间结社已经沦为简单的暴力团体或者“邪教”组织，华裔学者陈志让在论及近代秘密结社时说：“秘密结社或会党的表现一般地都很不好，很幼稚；到处捣乱，生活习惯很腐败，没有建设新政权的蓝图，只起了些消极破坏的作用”，^②可谓准确的判断。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且包含的独特经验，具有显著的复合性。革命运动的发生，在于革命意识、主体阶层和领导组织的形成与扩展。1894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抵达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吸取了传统会社歃血盟誓的方式，凡入会者须高举右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③部分会党组织不同于“打家劫舍”的盗寇，其朴素的“劫富济贫”、“反清复明”、“民族革命”等口号，一定程度上与中国革命的目标相匹配，“隐然为一国之大势力，革命党亦从中运动，徐图改良”，^④以致“众兄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⑤从秘密会党到现代政党，社会动员与网络结构的建立，政治力量的重构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在轨迹上颇具一致性。传统中国的民间会社与叛乱活动拥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特征。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系统比较各种结社如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黑手党、秘密宗教会社、拉扎雷蒂派、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发现了原始组织的转型机制，早期结社多存在严谨的入会形式、定期性的集会典礼、使用各种象征符号，随着社会运动的日益现代化，取而代之的是明晰的意识形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促进了社会运动的扩张。^⑥1927年之后，中共“湘鄂粤赣”地区在动员方式上“联合一般失业的贫农会党等势力、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它支部发生关系”^⑦的政策，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可见，现代国家政权-民间社会的二元互动，在组织化进程中汲取了中国古典式结社的历史资源。秘密结社的组织转型，在主动或被动中也适应了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

国共两党在自身力量扩展的前期，对于秘密社会皆有不同程度的利用与改造，利用帮会分子或以帮会身份行走，把底层不安定力量由革命的对象变成革命的同盟，以符合自身的革命目标。秘密会党的民众动员和仪式建构的方法，“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况且秘密结社也“合乎江湖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3）：《民国帮会要录》。北京：档案出版社，第159页。

^②陈志让（1980）：《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0页。

^③冯自由（2011）：《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11页。

^④李天纲编（2010）：《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梁启超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49页。

^⑤寇望卿（1914）：《蜀路风潮记》上册。成都：1914年石印本，第33页。

^⑥[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014）：《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6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1982）：《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2、106页。

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①，早期革命党组织借鉴了此种经验。借助于旧式行会、秘密结社发展组织，提高自身实力，也是中共一个阶段性策略。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题序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其中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②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不能集中，地方主义色彩浓厚，迷信很强，自信力薄弱，民族观念很深，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坚固，”并指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难的事情”。^③同样的表述也见于早期中共领导人邓中夏，他认为民间力量往往“只问面包，不问政治”。^④同时，在批评的基础上主动改造。1939年5月周恩来在视察皖南新四军干部大会上要求“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⑤在社会主义发源地上海，中共中央指出“青红帮及秘密结社分子很多，应用教育宣传之力防止其流弊”。^⑥毛泽东也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员方向，“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⑦

1930年代，出现了两部有分量的、由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编撰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著作，分别是薛农山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与蔡雪村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薛农山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并提出了农民运动中三个重要的问题，即土匪问题、会党问题、富农问题。在会党问题一项中，“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的农村当中，有一种伟大的力量的农民组织。这种组织的总的名称，便是名播中外的红枪会。当然，这一红枪会组织的名词，他充分地象征了农民原始的、迷信的意识。然而，问题正从这里发生。这些很奇特的原始的、落后的农民行动，他是不是某一些好事者从中煽动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而是农民生活痛苦的反映”。^⑧蔡雪村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研究，同样具有系统性，采用了“唯物论”的视角，分析了自秦末之后的历次农民战争：

从满清盘踞中原之后，除了明室孤臣孽子所进行的纯粹的反清复明运

^①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1985）：《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第228-256页。

^②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4页。

^③《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6月），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编（1986）：《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④邓中夏（1983）：《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页。

^⑤周恩来（1980）：《周恩来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⑥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9页。

^⑦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6-607页。

^⑧薛农山（1935）：《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第634页。

动自有其意义之外，就中吾人认为最有价值和确有下层群众基础的运动，厥为秘密会社和神道设教的组织。由三合会、白莲教、哥老会、天理教以迄太平天国之上帝会，其间似有一脉相传的联系，而这些秘密会社的政治经济背景至太平天国始如含苞之花而大放。由是可知，三合会、白莲教等的历史意义绝不在上帝会之下。^①

1942年，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谈辛亥革命》一文，回溯了中国革命史、孙中山早年与会党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历史解释的“统一战线”内涵，“中国近代革命可以追溯到康乾年间，最初源于闽粤三合会，及由两湖渐次向北方发展之哥老会。孙中山革命首先即与会党联合，然后方蔓延于留学界、华侨、国内新旧军阀和广大知识阶层。迨川案发生之后，革命基础更及于中小地主和农民。中国革命的经验早就证明，统一战线成功，革命就成功。否则，即遭失败”。^②大革命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扬弃了共产国际的“城市革命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举办农民讲习所，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打土豪”、“驱劣绅”和“平分土地”，通过形式不同的斗争、诉苦和公审大会逐步瓦解了农村传统权威的力量，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性力量被制度化激发，从精英主导走向农民主体。中共对于农民的动员与管理，建立了一种基于乡土社会的革命结构。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主体概念，建立了执政的基本盘，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其他力量的统一战线。关于农民参与革命的机制，周锡瑞有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在中国农村，农民对新政权最大的要求是公道。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党的干部不偏袒，带头做出牺牲，过着远离腐败的简朴生活，并且保证革命斗争的重负被平均承担。因此，农民高度拥护共产党强迫二流子投入生产劳动。同时，他们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③

蒋介石虽然注意到了农村的重要性，“我们一切设施，以后不仅要注意都市，而且更加注意到乡村僻巷。要知道都市的事情，不过是我们全部工作百分之一二的事情，其余尚有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事情，都在各县地方乡村里面”，^④但国民党权力结构与治理效能层面的阙失导致“党治”效能距离基层社会甚远。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自身领导权建设，从1921年至1949年建国，特别是通过政治肃反、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取缔会道门和封建把头运动，“分化和瓦解帮会武装，在城乡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连根铲除了封建帮会得以滋生、生存和发展的土壤”，^⑤彻底重构和净化了农村盘根错节的旧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八个省土地改革结

^①蔡雪村（1933）：《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21-722页。

^②林伯渠（1996）：《林伯渠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第279页。

^③[美]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见董玥主编（2013）：《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81-213页。

^④蒋中正（1935）：《推进政治应注意农村之建设》。《四川经济月刊》第1期，第1-33页。

^⑤邵雍（2002）：《中国秘密社会》第6卷《民国帮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396页。

束后至 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十七个省、市、自治区 1956 年农村典型调查》中所做的统计，“普通农民已经占据了基层党支部中党员、委员的绝大多数，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①这些事实证明，这种发展路线和动员策略更有利于革命成功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日军全面入侵之后，各界将帮会视为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1938 年，王晋伯在重庆独立出版社编著了《抗战与帮会》（抗战建国小丛书），指出了帮会对于反日的价值。抗战胜利之后，联合秘密结社又被赋予了国共政争的意义，“凡群众之已被共产党运用者，由本局策动各帮会以全力争取之”。^②早期中共组织“喝血酒，跪拜天地为誓”，^③仅仅是一个阶段性表征。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野得以彰显。同时，政党与乡土社会也建立了不同于古典中国的血脉联系。合理运用秘密结社及其武装力量，带有早期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和革命者联合社会力量的政治智慧。

民间秘密结社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投机性，难以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会党“旧势力”与政党“大革命”之间的纠缠冲突，塑造出 20 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民间秘密结社的真正消退基本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且经过了复杂的斗争。可见，民间结社一方面促进革命的发动，另一方面则明显拖累了社会整合的进行。要言之，以革命为目标的进步政党塑造了 20 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在权力扩展和动员模式的网络结构下，聚合了底层民众并组织起来。确切来说，秘密结社与革命运动的起源之间，具有明显的事实关联。由秘密结社带来的人群集聚、组织结社和反政府心态的发育，无疑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源之一。

三、结语：传统秘密社会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源流

传统中国农村的互助伦理、信仰需求与被庇护的期待，是民间会社的思想渊源。晚清之后各类秘密结社的名目不同、起源不同、地域不同、仪旨不同和规模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成为 19-20 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被赋予了民族革命的显著色彩。这提示现代研究者的是，如果将民间秘密会社置于宏观视角来考量的话，会呈现出一种联结着社会转型方向的内在理路，关切着三个学术价值上的问题：（1）国家治理模式的复杂性；（2）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过程；（3）革命力量和革命运动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对于民间不安定力量发育的解释，学术界一般来说多立足于压迫-反抗的模式。这种思路包括了“官逼民反”（官民矛盾）和阶级间压迫（阶级矛盾）。所谓“吏治不修，政弊民困”、“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等古典表述，加上农村地权逐步集中，致使民众税负增长、生计堪虞，失去土地者揭竿而起。在自然灾害的催化下，被迫流为盗寇，走上叛乱之途。清代官员刘坤一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秘密结社者最初并非是为了反抗政府，多数是生计导致的穷途末路，“江湖流荡之辈固趋赴不惶，市镇负贩之辈亦相从而靡，盖初不料

^①李里峰（2017）：《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第 1 期，第 5-10 页。

^②邵雍（2010）：《1945-1947 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民国档案》第 4 期，第 116-121 页。

^③丘倜：《关于于都暴动的情况》，见陈毅、肖华等（1981）：《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第 28 页。

其为逆而计在于避祸也”。^①但此类看似自洽的表述却忽略了一点，在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或基层生态变异时期，由于地方行政制度不健全和职能失衡，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使得权力失落和出现管理真空，这种过渡性特征导致原有的行政管控与社会现状难以弥合和嵌套。也就是说，即便是地方官府不因循、不腐败（而且是否真正腐败、腐败到何种程度还需再细化考量），在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地方官僚也往往首先“政治蒙饰”和“虚拟太平”，无法面对民间社会形成的新情况，生出治理无力之态。一些学者利用公元 25-1911 年的历史资料，关注到了气候变迁与政府能力对于农民起义的影响，侧面说明了这一点。^②经验丰富的专业官僚是需要长久历练的，但是在单向化权力系统中容易形成一种不易变通的路径依赖。因此，晚清社会呈现出结构性变异和制度性矛盾，基于偏重于政治、经济解释之下的压迫-反抗模式，其价值判断恐怕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无法实现宏观理论与微观个例的合理对接，而基层行政“制度失落说”或应是直接致因也更符合清代中后期社会管控出现的衰颓之迹。

其次，基层社会控制模式变动及权势移易是一个屡见争议的学术论题。近代社会转型之剧烈，在事实上逐步改变了皇权-绅（族）权这个二元结构。帝国晚期社会管理力度趋于弱势，各级刑律及常态模式逐步走向失效。从整体的发展方向来说，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与底层革命的发育主要体现有三个趋向：一是政府管理层次上从国权式微向非正式权力系统的移易，二是治理模式层次上从传统法理惯习向暴力与军事化方向迁转，三是从革命发育层面看，由官逼民反（压迫-反抗）的二元模式向由进步思潮引导方面变化，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和变异色彩。李细珠论及晚清政治权力格局之时，在修正以往“外重内轻”^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内外皆轻”^④的论断。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权力在一定阶段内是一个恒量，权力的具体去向如何解释呢？引入基层权力变动的微观视角，在传统政治组织及结构的不断衰退式微下，使得各种社会力量缺乏制约，不断兴盛勃发：新军、会党、教门、革命党、商会、民间社团、土豪劣绅、土匪等。基于中央权力的强度（况且处于式微状态）和治理成本之故，朝廷及地方政府无法延展和渗透至基层乡里社区，那些“素孚民望”承担宣德教化、引民成俗的部分士绅也演变为“刁生劣绅”甚至纠合结社匪徒，这些新兴势力继替或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原有的治理秩序，是一种权力流动与继替的结构性变动。辛亥革命之后，民间武力勃兴，把持地方事务，“军队所发布之命令，都必须盖上会党的印戳才有效”。^⑤原有权势的消退、摧折与演变，秘密组织的广泛活动，构成了清中期至民国一个变动不居的基层格局。杜赞奇之论或有补益，“新的权力载体迅速填补乡绅退位的权力真空，导致国家政权机能的内卷化”。^⑥与传统帝制下“奸民-良民”这一辩证评价不同的是，革命党对于秘密社团的导引，消解了“正统

^①陈代湘编校（2018）：《刘坤一集》第 5 册。长沙：岳麓书社，第 531 页。

^②陈强（2015）：《气候冲击、政府能力与中国北方农民起义（公元 25-1911 年）》。《经济学（季刊）》第 4 期，第 1347-1374 页。

^③罗尔纲（1937）：《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2 期，第 235-250 页。

^④李细珠（2012）：《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第 3 期，第 1-29 页。

^⑤中国史学会编（19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 6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7 页。

^⑥[美]杜赞奇（1995）：《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0-59 页。

-异端”之间的界限。在“革命-反革命”、“破坏-建设”的新关系下，革命即良善之辈，反革命自然属于游荡匪类。无序的民间力量和会党结社借助于革命的东风点燃了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从而又被革命党进一步塑造成了进步的革命力量。

再次，秘密结社展现出的力量可以视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传统结构。随着革命风潮的传播，传统的基层变乱模式在承袭古典资源的同时也发生了转变，政治运动依靠的力量往往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特征，“省界亦深，政党未成也”，^①塑造了清末民初极具时代性的政治格局，影响了20世纪前期中国政党控制的下沉和衍生。作为潜在的不安定力量，至辛亥革命之前，各个地域初步形成有民间势力参与的地方权力系统，秘密结社公开化与团体化，会党首领政客化，成为地方社会的“巨匪强人”，北洋时期地方军阀的滋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趋向。晚清之后地方首领及强人，获得了权力下沉之后的控制权，逐步塑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并逐步被政党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所吸纳，改变了传统中国“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的局面。同时，植根于基层社会的秘密结社和民间组织影响了各级政府的权威和促发了权力秩序的重构，给予社会机体破坏性的打击。进一步来说，这一问题指向的是一个乡村社会控制的模式嬗变的动态问题，而寄身于基层的秘密结社则无疑积蕴着底层革命的种子，在变动时代爆发出农村革命的根本性力量。随着社会运动的日益现代化，秘密结社的文化渐次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明晰的意识形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

最后，国共两党与秘密结社之间的关系，分为不同的阶段，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国民党由于早期革命（联络、拉拢新军及会党）的动态策略，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是一种介于合作、利用与领导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主动性与被动性兼具。1928年北伐建政之后，国民政府并未彻底完成对江湖力量、会党演变而来的政党以及各个地方军事地盘的改造与领导，甚至会党旧势力凌驾于“党治”之上。1928年北伐建政之后，国民党一度将会党事迹、晚清民变、秘密武装乃至清代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等民间结社的反抗纳入民族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的叙述体系之内，但“三民主义”的党义建设并未消弭早期革命联合过程中的“各自为政”状态。会党、新军、革命党人、留学生与地方豪族的联合，客观上造就了国民党根子上“弱势独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尽管也注重对于会党帮会的改造，但形成了一套基于党支部建设、行之有效的领导机制，构建“党指挥枪”制度，与一些地方会党组织、旧式帮会武装合作但不为其左右。在党领导下“干革命”和组织起来，塑造出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重革命力量合作的格局。在阶级成分的标准下，鼓励自发性的农民运动，打击“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重新建构起了基层中国的社会秩序。共产党人更加注重思想建设、作风引导和党的坚定领导，通过历次斗争、“整风”和学习活动增强队伍的纯洁性，一步步避免了权力分散、地方主义和党权虚悬的弊端，凝练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与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经验与党建路径，形成了比国民党更高效、更团结的“列宁式政党”。共产革命发动及其成功，塑造出与传统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不同的机制，在马克思中国化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下，底层民众在政治层面从边缘走向中心，展示了现代中国革命何以胜利的底色和渊源。

^①汤志钧编（1977）：《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第587页。

总而言之，回归到本文的主旨，19-20 世纪中国底层革命与组织化趋向，是现代国家动员与结构的形成基础。抽取出共性要素，构成了秘密社会史之所以不同于江南、华南、西北、华北抑或其他区域史的内在原因。透过秘密社会的浮沉流变，近代中国的游民抗争与政权再造，是观察地方社会变迁的视窗与切口。更为重要的是，寻找中国革命的起源与动因，离开对于秘密结社的纵深讨论，是很难说清楚的。

作者简介

王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史、政治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史。近五年来，主要关注早期中国革命史的形成机制与历史书写，勾勒与溯源 20 世纪前期革命观念的演化脉络，曾在《史学月刊》、《澳门理工学报》、《政治思想史》、《清史论丛》、《城市史研究》、《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民国研究》、《区域史研究》、《复旦政治学评论》等学术杂志发表相关研究性论文 10 余篇。

此为工作草稿